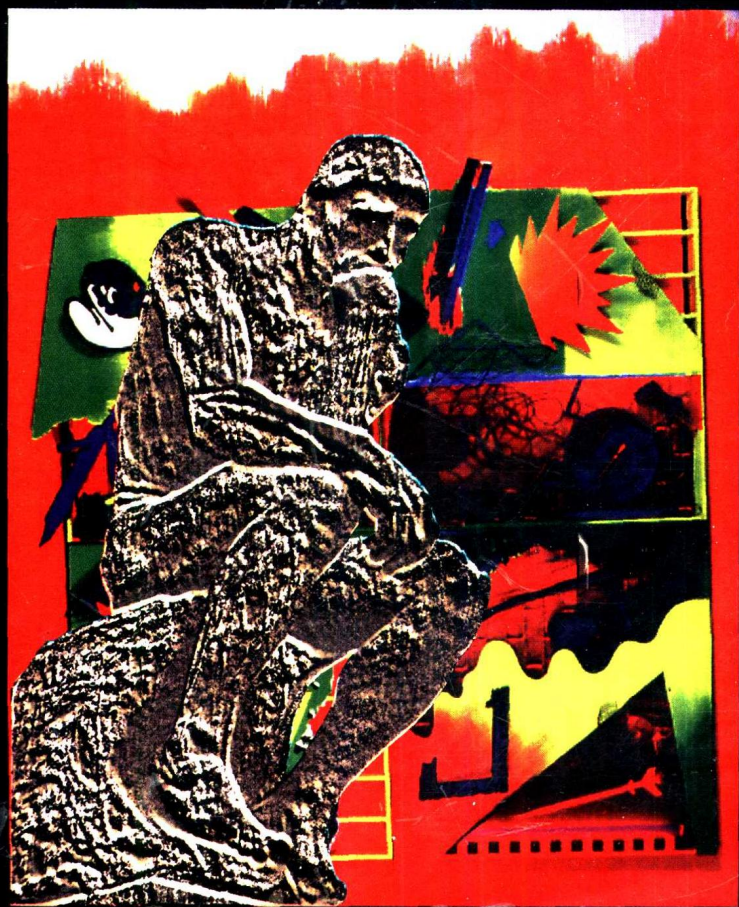


西方文化概论

XIFANGWENHUAGAILUN

启良 著



花城出版社

西方文化概论

启良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化概论 / 启良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11

ISBN 7-5360-3051-7

I. 西… II. 启… III. 文化-概况-西方国家 N. G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5592 号

西方文化概论

启良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番禺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番禺市石楼官桥村)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875 印张 1 插页 393,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60-3051-7

G·147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引 论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兽之别，就在于人于本能之外拥有一个文化的世界，而动物只能本能地生存。所谓人是政治的动物，理性的动物，符号的动物，历史的动物，社会关系的总和诸种说法，均可概言为人是文化的动物。因为政治、理性、历史、符号、社会性等等，或为文化的一部分，或与文化同义。

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一定义，决定着人的伟大与高贵，同时意味着他的有限与无奈。一方面，凭藉文化，他既可适应自然的恶劣，亦可使自然人化。但另一方面，他拥有文化，无异于在自然的压迫之外，为自己锻造了一副新的镣铐。他希图文化改变自己的处境，实则如同追逐自己的影子，永远也达不到目的。他疲命于文化，旨在文化能给他带来更多的自由，但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又意味着或暗含着对自由的伤害。自由只有在自由无意识的情况下方可拥有。一旦自由作为追求的对象，同时也就意味着自由的失去。黑格尔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却不知对必然的认识，正是对自由的放弃。

人是上帝的造物。上帝是偏爱人类的。他创造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都只能听任自然的摆布，而惟独给人意志的自由。然而享有自由意志的人类首先想到的却是犯罪，即偷吃

禁果。

吃了禁果之后，人类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依上帝的意思，人的眼睛是不能明亮的，明亮了就会引来灾祸。

按照撒旦对夏娃所说的，眼睛明亮的人类可以同上帝一样。上帝的伟大是因为他的创世奇迹。同上帝一样的人类，其伟大亦在于他们可以撇开上帝，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来。只不过，这世界不是自然世界，而是文化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同人是上帝的造物两种说法，原本是可以相通的。二者所依据的前提都是人的自由意志。

自由的拥有，同时意味着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的要义即责任。作为上帝的造物，他们必须痛思自己的罪过（即偷吃禁果），同时在德性实践中洗去原罪；作为文化的动物，他们必须认识到文化于人生意义的限制，以免文化的扩张而侵犯人生的领地。然而，人类至今这两方面都是失败的。他们非但认识不到自己的有限与卑微，而且按照撒旦所指引的道路发展，即试图学着上帝的做法创造世界。人必须意识到自己悲苦与渺小。一旦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或者说学着做上帝，就势必使自己的悲苦更甚。人类今日的困境，根由就在于他们的狂妄和自大，试图以有限之身去做无限之事。

二

人类拥有文化，已有漫长的历史。但在史前社会，文化对人的负面意义尚不明显，或者说人们根本意识不到他们当初所创造的文化会将人类带到今日这种困局。那时候，文化的功能仅仅在于弥补人类生理上的不足。发明石器和弓箭，只是因为

他们无利牙利爪抵挡野兽的攻击；学会用火和建造房屋，是因为身上无厚层的皮毛可以御寒。即便音乐、舞蹈、绘画等等，仍是为了适应自然，解决的仍是温饱问题。由于温饱问题是当时人类全体的共同问题，所以他们创造的文化也就大同小异。

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权力、财富、荣誉等方面的追求遂使社会变得复杂起来，人心所求不再仅仅是温饱二字，所面对的亦非仅仅自然环境的恶劣。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像史前社会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灵与肉的斗争开始尖锐起来。也可以说，原始人所面对的只是自然一个问题，而文明人所面对的则是自然、社会、人生三个问题。问题的复杂化，使文化亦变得复杂起来，最明显的一个变化，便是各民族各地区由于历史背景和所面对的三个问题之关系的不同，文化遂由一元变为多元。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形成体系且传统、悠久的却只有三家，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印度文化虽历史悠久且极有个性，但毕竟除宗教之外，可值称道的东西不多。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几千年，最具光辉的实则只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家。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和西方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只是到了近代，双方才开始有了全面的接触和交流。

各民族间的文化接触和交流，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近代以前的中国与周边民族，就有过千百年的文化交流史，且均在一种相对和平的背景中进行的。而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伴随的却是血与火的场景。西方列强凭着船坚炮利，且带着不甚光彩的掠夺动机，硬性地将其文化送到中华大地。

两种最为光辉最成体系的文化一旦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写下人类历史最为悲壮的几页。只是吞下悲剧苦果的不是西方人，而是被侵略被掠夺被欺凌的中国人。正如马克思所言：

“陈腐的”中国代表道义原则，但却必然地要在同“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的西方人的“殊死的决斗中死去”；这真是人类的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三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是否已经“陈腐”，实是再可商量的问题，但文化冲突所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伤害，则是事实。今日的中国虽然版图还在，人口还在，但作为文化的中国是否还在，实在令人难作肯定的回答。没有文化的民族，如同没有血肉的躯壳，很难说生命仍在。

为何具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被马克思不幸而言中？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它的“陈腐”和“愚昧”？更可注意的是，真正替代旧式中国的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而是他所憧憬的且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某种亲缘关系的社会模式。

言其“陈腐”和“愚昧”，只是欧洲人的话语，其思想根源是从亚里斯多德一直到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虽然具有世界性关怀的马克思，眼光已远远超过了黑格尔，但以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看待世界历史，同样是有待完善的。

第一，当时的中国就其本身来说，并非都是“陈腐的”。如果没有西方人的入侵，没有西方价值观的参照，按照中国原有的历史模式而发展，很难断定它是否“陈腐”，是否必然“死去”。

第二，中西文化的全面冲突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历史巨变的环节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其遭受资本主义的冲击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地理大发现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身却带有偶然性。

至少在时间上就是偶然的。西方文化之类型决定着它必然要走向全世界，但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断定，这一事件就一定发生在十五、十六世纪。假设不是此时，而是二十世纪的今日，或者再往后延长几个世纪，谁也说不清情况该是怎样。不可否认，无论何时世界联为一体，唱主角的只能是西方人，但是冲突的场面与结局完全有多种可能性，中国也并非一定会落到今日这般惨境。至少，给民族带来实质性灾难的所谓“路线斗争”就不可能发生。

第三，即使文化的冲突发生在十九世纪，也不见得中国就一定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如果中国人明智地接纳西方文化，而不是出于非文化的因素而予以抗拒，亦难说中国就没有焕发青春之可能。中国向来就有文化宽容的大度，异域文化的补血，只有助于它的维新，而不会断其血脉。纵使全方位的文化更新，从根上清算旧文化的痼疾，也不见得中国就不是中国。谁家的血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延续生命。怕只怕谁家的血脉也没有，充塞血管的只是一些气泡，或者说注入的血液本身就是坏血。

第四，十九世纪的中西冲突，所表现的主要在器物层面，而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冲突，则很少有人认识到。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一方是子曰诗云、田园牧歌的无时间性的历史积聚和绵延，另一方是适者生存、恶魔般的科技文明日新月异；一方是诗人、秀才、道学先生和安时顺处的国民，另一方是大兵和强盗；一方是女性化的柔弱且惯于内讧，另一方是粗暴的男人以征服为乐。如此两种文化的较量，前者抵挡不住后者的强暴，自是情理中的事情。但是中国的悲剧或许正在于：两种文化之间并没有发生“殊死的决斗”。决斗的只是在战场上和商场上，文化领域始终没有受到致命的冲击。“五四”运动权可看作“决

斗”前的初试锋芒，但却随即偃旗息鼓。其后虽仍有散兵游勇，但火力却是极其的微弱，不足以对固有的文化构成冲击。

也就是说，秀才与大兵的较量，只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现象，或者说是国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场较量的实质所在。实际上，一个多世纪以来，真正对中华民族构成伤害的并不是“大兵”，而是“秀才”。准确说，是中国的大部分“秀才”与西方的少数“秀才”（包括俄国的“秀才”）走到一起，谱写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大兵”只是打开门户，收获的只是一些经卷、古玩或短时间黄土地上的耀武扬威，而这些“秀才”所收获的却是整片国土和几万万国民的灵魂。三十年前，“祖国河山一片红”实可看作对我国土和国民灵魂之收获的象征。“大兵”的强暴所换来的是国人的愤恨和反抗，以及对“西化”一词的厌恶；而“秀才”的强暴所得到的却是被强暴的国民的欢欣鼓舞，以及由衷的虔信和迷狂。作为文化的中国，亦由之而被沙漠化、赤贫化。

如果说，中西文化的冲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那么悲剧的造成并非“秀才”与“大兵”的相遇，而是两地的“秀才”联手合作，将吾国吾族推向万劫难复的死角。

因之，百年中国问题的实质不在“大兵”对“秀才”的强暴，而在于国人为何乐于接受“秀才”的强暴，为何西方的秀才们大部分被国人挡在门外，而对其小部分的“秀才”却又如此钟情和倾心？

四

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由人所创造。因之，文化问题即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主要是他们同上帝的关系问题，或者称作“天人”关系问题。可以说，中西两方各自落入今日的文化

困境，全因人的自以为是和自不量力，僭取上帝的位置，做了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

本世纪的胡适、陈序经们曾有中国“百事不如人”的说法，委实只是“矫枉过正”的权宜口号，不但与历史事实大有出入，而且也很难说就是他们的心里话。中国文化悠悠几千年，不可能“百事不如人”。比如文学、艺术乃至语言文学等，一点也不在西人之下。再如中国的饮食（现代人称之为“食文化”）更是世界一绝，不论放在何时来看，都是其他民族无法企及的，而且也不是别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学会的。若论国粹，这是吾国吾民的第一国粹，最值得骄傲。然而，在人类事务与上帝事务之间，中国人的处理很不恰当。除了为日常生活的祛灾除难之外，中国人是不需要上帝的。他们深信，凭着人类自己的精进努力，也可创造出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

尽善尽美的世界，向来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如何实现，各民族有着不同的进路。中国人选择的是内在超越之一途。这一途径，按照儒家的理论预设，既可纯洁人心，亦可和谐社会，其经典表述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靠人类自身的努力而安顿人生和协调社会，从理想的层面说，未尝不可。但这里必有一个前提，即人人都有成贤成圣的自觉，都是理性中人。然而人之为人的本质又决定了他们是不可能都变成圣贤的、感性的欲求远远超过理性的自制。修身之必要，就在于“身”是有缺陷的，有着恶的一面。宋明儒认为人性原本是善的，如同白日青天，只是因为乌云遮蔽，才使得人之善性不彰，而修身也就是驱散乌云，使人之善性得以昭显。此种说法，学理的欠缺是：一，既然人性原本就是白日青天，乌云何以形成？二，乌云所以形成，说明人性是有弱点的，靠人性本身的力量又如何可以驱散乌云？如果可以驱散的话，那么它也

就有可能使乌云不得形成。反过来说，乌云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仅靠修身之一途是不能将其驱散的。

人生是经验性的，一切都在此岸世界。然而正因为是经验的和此岸的，它才需要超验的接引和彼岸的光辉，即便此岸理想的落实，亦需彼岸的原则。人是大地儿子，但又只有超出地面，才可充分体现大地的意义。他不能自己扯着头发离开地面，只有靠外在的力量才能做到。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之所以徒劳，是因为无法克服地球的引力。同样道理，靠“修身”而提高人生的境界之所以难见实效，乃是因为无法克服感性生命的引力。

感性生命引力的克服，必须具备如下两点认识。其一，承认此种引力的经验事实，并将其定义为恶；其二，充分认识到引力与引力之克服的关系为一物理学上的关系。一个物体，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方可运动和变化。同理，人生的超升亦需外力的提携。

纯洁人心的外力，就人类至今为止的德性实践看，不外乎宗教与世俗两途。宗教外力，一是彼岸的引力，二为教规的约束；世俗外力，一为道德规范，二为习俗的制约，三为制度化的规章。德性实践有自律和他律之别。所谓外力，即是他律。在自律与他律之间，重要的是他律。就一人一时而言，自律是存在的。但是他何以能够自律，动因还是出于他律。也可以说，自律是虚拟的，他律才是实在的。

而且，宗教与世俗之二途，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宗教，而不是世俗之途径。这是因为：一，只有宗教方能将利己与利他诗意地结合在一起，或者说由利己的动因转化为利他的行为和境界；二，只有宗教才能充分体现人类全体的德性实践同终极关怀的合一；三，表面看来为世俗外力的道德规范或制度约束，

其根柢仍在宗教层面。任何道德行为，均出于人类平等的观念，而这一观念不可能产生于世俗的经验事实，而只能导源于宗教。

因之，人心的安顿，社会的和谐，只有上帝的王国才能实现这一理想。人类之所以需要上帝，就在于有些事情是他们力所不及的，非依靠上帝不可。如果贸然去做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其结果必是灾难性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天人合一的思维与内圣外王的自信，非但没有营造出太平世界，反而成了一切文化与政治弊端的根源。专制统治，官场黑暗，伪善流行，人心虚假，动荡频仍，民不聊生，无不根源于此。也可以说，儒家学说可能训导出少数人的道德人格，但营造的社会却是不道德的。或可说，在理想的道德人与现实的不道德之社会的关系上，儒家始终拿不出切实的办法使二者勾通。而且，它对道德人的强调，还正是社会不道德的根源。

五

相对于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人，西方人是相信上帝的，其文化各个层面上的成就，亦无不基于对上帝的信仰。

信仰上帝与否，实质在于人类对自身的看法。作上帝的信徒，意味着人类对其生存处境的自觉。人是有限的，偶然的，悲苦的，这一基本事实导致人类在自身之外寻求他力，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人的生存境况，必须自视为渺小和卑微。因为只有自觉到渺小的人，才有放大自己的可能，也才能为自己的行为划定边界；只有自觉到卑微的人，才有可能追求崇高，才有可能不断地告别卑微。人的有限与世界的无限，其间有着漫长的距离。人类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这一距离，才可能在这茫茫世界寻到安身立命的定点。在这里，上帝既是无限世界的代名词，又

是沟通有限与无限的桥梁。通过上帝，有限的人类与无限的世界取得联系，从而变有限为无限。或者说，有限的人类试图通过对无限的追想而克服自身的有限。

对自身的有限性的自觉，西方人是从两个方面而展开的，一是对人性之恶的自觉，二是对无知的自觉。

对恶的自觉即对人类罪恶根源的认识。一方面，人必须肯定自己的受造身份，肯定自己的生命之源在上帝那里；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时时想到自己有负于上帝，自己的一切苦痛与罪孽皆出于对上帝的不敬。对恶的自觉，表面看来是对人的贬抑，但是由于上帝的仁爱和全能，人却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颂扬，并由之而有了克服人性之恶的途径。无神论者视上帝为谎言，却不知人类对上帝的信仰所体现的正是他们的诚实。因为只有在上帝面前，人才是诚实的，才可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上帝是一面特殊的镜子，只有站在这面镜子面前，人才能看清他那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嘴脸。

对恶的自觉，意义既在人类的自我认识，更在于对恶面的克服。就西方历史而言，恶面的克服有两条途径，一是教义的诱导，二是世俗化的制度建设。前者凭热情，做的是内圣功夫，或者说是道德良知的发扬与落实；后者虽是冰冷的，缺少人情味，但其放大于社会则又是有情的。因为只有预设人性为恶，才有制度建设之必要，亦才可能真正做到对恶的克服。霍布斯认为人与人之关系如同豺狼一般，休谟提出“无赖原则”，并非劝导世人都去做无赖或豺狼，而只是逻辑预设，为的是给合理的社会制度定立人性的根据。近几百年来，西方的民主政治、法权体系之所以能够得以健康发展，原因也就在对恶的自觉。人类历史就是这样的诡秘：肯定人性为善并鼓励人人学做尧舜的中国人，其结果只能换来不道德的社会；而承认人性为恶并鼓

励自由竞争的西方人，道德的风景反倒比中国的要美丽得多。

对恶的自觉，意在解决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对无知的自觉则是为了解决人同自然的关系问题。

人同自然的关系属于历史的范畴。古代社会乃至原始时代，人类了解自然是为了适应自然，而现代人了解自然是为了对自然的宰制。但无论如何，自然同人之间的距离，人是无法将其缩短的。现代人认为随着知识的增多，人对自然的秘密了解增多，就可缩短同自然的距离。实际上，此种想法纯系天真。自然的秘密是无限的，渺无尽头。其无限同人的有限之间，严格说来是空间的“距离”所不能指称的。尽管有限的人类总是试图去探索无限的秘密，试图缩短同无限的距离，但实际上，既然二者为有限与无限之关系，也就决定了二者始终只能处在相对的两极，人永远也摆脱不了他的有限性。

但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即在于，正因为他是有限的，他才会有追求无限的理想；正因为他是无知的，他才会去追求知识，去努力探寻自然的秘密。一方面，他将上帝作为最后答案；另一方面，上帝作为信仰的对象又保障了他的世俗的学理探索成为可能。而这一切，都必须以自我的无知为前提，为逻辑起点。承认自己的无知，并非甘于愚昧，而是精进向上的健康心态。有此心态的人是不会甘于现状的，内心总会饱蕴着求知的冲动，不管这冲动是出于功利性的，或是纯粹为了知识而知识。西方人千百年来对自然的思考，一直居于其他民族之先，就在于他们对自身无知的自觉。

六

很难说清楚，西方人崇拜上帝主客二分，究竟是一件幸事，

还是一件祸事。一方面，上帝信仰主客二分给他们带来了灵魂的安顿、制度的健全、科学的昌明，但另一方面亦给他们带来了狂妄、自信以及由之而引发的科学主义的膨胀和人文家园的失去。且不论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如何扼杀人性之真，就是在近代的科学理性得以高扬之后，基督教同样以双刃剑的文化品格制约着西方文明的发展。今日人类的困境，如生态失衡、能源危机、核武器威胁、道德滑坡、人心无根、家园被毁，均可从基督教找到根源性说明。

然而，我们决不可以将此责任推到上帝头上，也不应该完全归咎于基督教。第一，上帝是完美的，并不蕴含恶的种子，因之从上帝身上是推不出恶来的。第二，主客二分的思维虽在基督教的教义里达到了经典的表述，但却并非发端于基督教，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开始热衷于知性追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知性的追求本是人作为文化的动物的一种天性，由他的有限性所决定。或者说，有限的人类为了克服其有限，必在知性领域追求无限。人类的烦恼即在于，他们追求无限，但又无法达到无限，而且事情还常常是，越是拼命地追求无限，越是显出他们的有限。科学至上主义对今日人类的打击，根源也就在这里。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人类今日因科学主义膨胀而陷入各种危机之中，原本就是人类全体的命定，其责任亦不应仅仅算到西方人的头上。

但是，科学主义膨胀所给人类的打击，这一历史性的和悲剧性的事件又确是由西方人导演的。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西方人充当了“历史理性”的工具。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西方人的科学主义崇拜，人类就不会受到科学的伤害，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是西方人对科学理性的过分张扬，至少今日之人类不会陷入如此困境。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于

人类的今日困厄，西方人又是难辞其咎的。

为什么信仰上帝的西方人到头来首先否定了上帝；为什么作为上帝的造物 and 自认为负有原罪的西方人会给人类全体带来灾祸？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得从人的生存境况说起，从他的有限性说起。在这大千世界，人是极其渺小的。因其渺小，他要放大自己。他信仰上帝，追求知识，发展技术手段，都是出于这一目的。从理想的层面上看，人是必须自甘于渺小的。因为只有自甘于渺小，他的内心才是充实的，才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划定边界。但是人的悲剧即在于，他将追求无限的希望寄托于上帝，但同时又想学着做上帝。世界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其奥秘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人作为上帝的造物，本应只能享受上帝所惠赠的一切，而不应该超出自己的能力，去僭取上帝的位置。然而西方人自古以来就抱着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人类同样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创造出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所以他们格外信任自己，信任知识的力量，用人的理性力量取代上帝的力量。却不知知识的发展应该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这一限度，必然带来灾难。他们一味地发展科学，并且试图按照天国的模式改造社会，其结果不但没能改变他们的生存境况，反倒将人类重新推到地狱的深渊。

七

也就是说，如果从人的生存境况同文化的关系而言，中西两方的文化都是有缺陷的，所行进的均非理想的途径。具体说，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崇拜扼杀了人性之真，并导演出一个不道德的社会；而西方人由于其科学主义崇拜，同样对人的生存造成了危害，使人的世界变成了机械化的世界，使人变成了机械

的奴隶和牺牲品。

那么，既然中西方的文化都有缺陷，为何两种文化一旦发生碰撞，中国的一方会明显地处于劣势？为什么今日的西方文化矛盾重重危机四起，而中国人还要将其作为强国兴邦的思想资源呢？

原因在于，现代人类仍以国家为单位，各国之间的关系为利益关系，而调整利益的仍是财力和武力。谁贫穷落后，谁就必然受压迫和欺凌，不可能拥有平等的地位和发言权。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华民族，至今还很难挺起腰杆说话，仍然被人家瞧不起，就是因为我们的贫穷和落后。

一个国家的财力和武力如何，首先是器物层面上的问题。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家是不可能富强的。贫穷不算罪过，但如果可以富强而没有富强，则又是应该自责的。偌大一个中国，人口占全体人类的四分之一，至今仍在解决温饱问题，无论怎么说，都是很不应该的。所以至今为止，科技兴国仍是吾国吾民的头等大事。“五四”一代先驱将科学作为标显的旗帜，可谓找到了中国贫穷、落后与愚昧的症结。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凯歌行进，事事处处均呈强势，亦在于他们科技文明的发达。

但是科技文明能否发达，又决非科技本身所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都有可能影响到人们的智力投向。科学重在求真，重在人类个体价值的实现，因而从本质上说，它的社会基础既在价值领域，又在政治领域。只有在个体为本位且以此为基础的民主自由的政治氛围里，科学才可能得以健康的发展。也可以说，任何试图以科技兴国为手段的社会变革方案，首先就必须为科学的发展营造一个相适应的政治环境。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想。百年来，我们一再强调科技兴国，但总是见效甚微，说穿了就是传统社会的政治